北魏宴会中的歌与诗

刘　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孝文帝改革对北魏政治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北魏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北魏宫廷宴会中的音乐与诗歌,是源于北族与中原两种政治传统的文化活动。前者在北魏前期近一百年历史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言,承担着阐述国家权力起源与政治交流的功能,却在孝文帝改革后,失去了发挥功能的土壤。后者则在孝文帝的推动下,与孝文帝其他改革措施一起,服务于北魏后期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的重塑,为中原士人突破通过婚姻、功勋而建立的,以鲜卑贵族为核心的政治圈层,提供了有效途径。宫廷宴会中的音乐与诗歌的盛衰兴替,既是北魏政治文化变迁的表象,也是促成北魏后期文学成为一种文化与权力资本的动因之一。

关键词: 宴会;音乐;诗歌;孝文帝改革;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K 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4-0110-11

在北魏史研究中,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传统且颇具魅力的议题。政治文化有很多载体,宫廷宴会即为其一。北魏时期,宫廷宴会包含骑射、歌舞、诗赋、赏赐甚至外交等多种内容。其中,骑射与赏赐作为游牧民族的常规活动,在北魏前、后期的宴会中一以贯之,并承担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功能。① 而在北魏与周边部族、南朝政权的交往中,宴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② 一直以来,学界关注北魏文学的发展和鲜卑贵族文士化的问题,③对于北魏时期的音乐机构与音乐融合也有讨论。④ 但或许由于宴会中歌舞、诗赋活动过于日常,学界对北魏宴会中音乐与文学活动关注较少。⑤ 宴会音乐的变化与诗赋活动的出现虽看似两种独立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北魏政治文化转变过程中的一体两面,直接反映了北魏后期宫

收稿日期:2024-11-30

作者简介:刘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① 佐川英治:《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02—136 页。

② 刘莹:《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颂(并序)〉为中心》,《历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56—76 页。

③ 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63—282 页;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第八章"北魏之南朝流亡士人与南北文化交流"、第九章"青齐士人之北徙与北魏文化之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6—195、196—224 页;王永平:《北魏后期与东魏、北齐之际上层社会之交游与雅集——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玄化与南风之北输》,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燕赵学术》2010 年春之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0—63 页;陈春霞:《孝文帝改革后的民族融合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一、二章"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文化转型与文学发展(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122 页。

④ 黎虎、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63—79 页;李方元、李渝梅:《北魏宫廷音乐机构考》,《音乐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40—46 页;王运熙:《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7—172 页;吴大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⑤ 讨论北魏宴会诗的产生及其功能的,有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第六章"北魏的歌诗生产与消费",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67—76 页;魏云洁:《中国古代宴乐的交流功能研究——从先秦到隋唐》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宴乐交流功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第 110—153 页。

廷文化的面貌。本文将围绕北魏宴会中歌与诗的盛、衰,特别是北魏宴会歌、诗的功能与意义,探讨北魏政治文化发展与转变的另一个面相。

一、北魏前期宴会中的歌章

北魏建国前,拓跋珪在讨灭后燕后,得其乐悬。建国初,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①并制定郊庙祭祀乐、舞。之后,太武帝在征伐中,从赫连夏“获古雅乐”,从北凉“得其伶人、器服”,但孝文以前诸帝无意于雅乐的建设,因此导致“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的状况。② 北魏前期,来源于鲜卑与北族的乐曲构成了宫廷音乐的主要内容。《魏书·乐志》载:

>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③

据此,北魏建国后,郊庙祭祀与宫廷宴飨中使用的实际是来自鲜卑的《真人代歌》,又杂以出自北族、且“多可汗之辞”的《簸逻回歌》。④ 这些乐章久已佚失,大概是拓跋一族的口述史,歌唱的是拓跋先祖开疆拓土、建立政权的历史,⑤由掖庭中的乐人用鲜卑语演唱,并以鼓吹为伴奏,与中原音乐颇为不同,但其宣扬祖先创业历程及权力来源的功能与魏晋时期的鼓吹曲十分相似。再考虑到其在郊庙宴飨中使用,有学者以此二者为北魏的雅乐,⑥不无道理。拓跋鲜卑没有文字,但有着长久的口头传诏传统,⑦宴会歌谣作为一种重要的口头政治表达方式,在北魏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并不少见。

天赐五年(408),拓跋焘出生,道武帝夜召卫王拓跋仪。入宫后,道武帝问其是否因夜晚召见而感到奇怪。拓跋仪表示不曾有疑后,道武帝才“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召群臣入,赐仪御马、御带、缣锦等”。⑧ 据《魏书》,拓跋仪乃昭成之孙、秦王拓跋翰之子。但学界亦有学者认为拓跋仪是道武帝之母贺皇后为昭成收继所生之子。北魏前期,父死子继尚未完全确立,兄终弟及在拓跋部族中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拓跋仪作为昭成帝的直系子孙,实际是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的。因此,此次夜饮很可能是道武帝与拓跋仪之间就权力继承进行的一次谈判。⑨ 而从拓跋仪的结局来看,道武帝对颇有器望的拓跋仪确实有疑忌,由此导致拓跋仪后来欲与穆崇为乱,最终于天赐六年(409)为道武帝所杀。可见北魏初年,来自鲜卑的兄终弟及的权力继承传统,与道武帝欲建立父死子继帝统之间的冲突,对皇帝与宗室造成的巨大压力。拓跋仪在宴会上“拜而歌舞”,不仅表达了祝贺之情,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语言,向道武帝表示了对皇帝及将来继承皇位的道武帝子孙的忠诚,成为君臣、上下之间政治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3 页。关于北魏以前雅乐的流传路径,参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第二部分第一章“楽制改革の歴史的前提——流亡する伶人”,京都:文理阁 2013 年版,第 178—198 页。

②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 2828 页。

③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 2828 页。

④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072 页。

⑤ 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202—231 页。

⑥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第二部分第一章“楽制改革の歴史的前提——流亡する伶人”,第 186 页;增田清秀:《北朝の楽府の實狀と歌曲》,《楽府の歴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 1975 年版,第 199 页。

⑦ 郑钦仁:《译人与官僚机构——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5—244 页。

⑧ 《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卫王仪传》,第 371 页。

⑨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第二章“太子监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2—111 页。

同样的事例还可举出两例。太和九年(485)冬至,冯太后与孝文帝宴飨群臣,“高祖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高闾因此盛赞孝文之孝行,“高祖大悦,赐群臣帛,人三十匹”。① 又,太和某年,冯太后与孝文帝在平城灵泉池“宴群臣及蕃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孝文帝为冯太后祝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② 孝文帝亲政以前,祖母冯氏是实际上的掌权者和统治者,甚至掌握着孝文帝的废立,因此孝文在冯太后执政期间,始终谨言慎行。从某种程度上说,孝文帝通过歌舞向冯太后表达的“孝”,与拓跋仪对道武帝展现的“忠”具有同样的意义。

而灵泉池宴会中,藩国使者和部落酋帅献上的“方舞”,不禁令人想起辽代天祚帝头鱼宴上女直酋长们的舞蹈。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恰逢头鱼宴,酒酣,天祚帝命诸女直酋长依次起舞,只有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以不能舞蹈表示拒绝,且劝之再三,仍然不从。萧奉先因此认为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劝天祚帝杀之。③ 北魏的藩国使者与部落渠帅献上的“方舞”,大概与女直酋长的舞蹈类似,也是周边政权与部落向北魏表示忠诚的方式。通过宴会歌舞,灵泉池宴会呈现出北魏帝、后与群臣之间忠孝和谐,各藩国、部落归心北魏的政治图景。

宴会歌章作为一种政治语言,也被用于统治者的施政中,典型事例仍见于冯太后摄政时期。太和五年(481),冯太后与孝文帝“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④此即著名的《劝戒歌》,共三百余章。《劝戒歌》的颁赐,发生在拓跋丕宅第落成的宴会上:

> 时文明太后为王叡造宅,故亦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飨宴焉。使尚书令王叡宣诏,赐丕金印一纽。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丕上疏赞谢。太后令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岂难致乎!”⑤

除了《劝戒歌》,冯太后还曾颁《皇诰》十八篇。《皇诰》并非冯太后一人所作,高允就曾参与《皇诰》的修订,高闾亦曾在皇信堂议政时上陈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及仰寻圣朝所行,事周于百揆,理兼于庶务”如何如何。⑥ 此“十八条之令”当即《皇诰》十八篇,是以太后令的形式颁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施政纲要。⑦ 从冯太后所说“臣哉邻哉”之语也可以推测,《劝戒歌》可能是规范君臣关系、约束朝臣行为的歌章。既被之管弦,当亦在朝廷集会、宴会中演奏、歌唱,通过音乐达到宣传政令、保持政治权威的目的。其与《皇诰》虽形式不同,但都是一种政治语言,服务于冯太后的权力和统治。

除了政令宣传外,北魏还常通过歌颂朝臣表达政治理念。太武帝曾令歌工“历颂群臣”,由此而有“智如崔浩,廉如(长孙)道生”的歌辞流传。⑧ 太和二年(478),冯太后、孝文帝临幸虎圈时险遭老虎袭击。当时左右侍御皆惊散,只有王叡执戟捍卫,王叡因此颇得冯太后亲任。王叡死后,葬礼成为平城士人、官僚社会中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冯太后、孝文帝亲临葬仪,加以赏赐,营建坟墓于平城东,还在城南大道旁为其立庙祭祀,刻碑铭记。王叡捍虎的形象被图画于平城宫殿中,由高允作赞,“京都士

---

①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 1203 页。

② 《北史》卷一三《后妃列传上 ·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496 页。

③ 《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364 页。

④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 2829 页。

⑤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列传 · 东阳王丕传》,第 554 页。

⑥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 1203 页。

⑦ 孝明帝时,任城王元澄曾“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览之,思劝诫之益”,此《皇诰宗制》或即《皇诰》中的某一篇或某一卷。既有“劝诫之益”,当是具有某种指示性的内容。《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 · 任城王澄传》,第 475 页。

⑧ 《北史》卷二二《长孙道生传》,第 812 页。

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①《中山王乐》今不传,猜想其内容大概是歌颂王叡忠心帝、后,勇敢无畏的精神。这支歌曲虽是“京都士女”所造,但其与平城都南的祠庙、宫殿中的图画与赞语共同构成了宣扬忠、义的政治话语。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意欲迁都洛阳,率众南伐,东阳王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孝文帝还平城,“丕请作歌,诏许之”。歌毕,孝文帝对拓跋丕说:“公倾朕还车,故亲歌述志。今经构已有次第,故暂还旧京,愿后时亦同兹适。”②拓跋丕是北魏宗室中的守旧派,传称其“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③ 其所作歌大概仍是鲜卑语,歌中表达的对孝文帝归来的企盼,正是其不愿迁都的含蓄反映。孝文帝心知其意,而有此答语。在北魏君臣几次交锋后,拓跋丕只能表示“仰奉慈诏,不胜喜舞”,④此“喜舞”或许也如前见拓跋仪之拜舞。由此,不仅是北魏统治者会利用宴会中的歌章作为施政的手段,鲜卑贵族与臣僚也会通过歌谣向统治者传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双方对这样的交流形式具有共识,宴会中的音乐、歌章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功能,成为北魏特殊的政治语言。这与北方族群颇具特色的文化生活与政治传统不无关系。

如上,北魏前期,以《真人代歌》《簸逻回歌》为主体的鲜卑歌、北狄乐承载着北魏开基建国的记忆,歌颂着历代统治者的功绩。类似《劝戒歌》的歌章是北魏朝廷施政理念的载体,规范着朝纲秩序、君臣关系。以《中山王乐》为代表的歌颂群臣的歌章,则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忠臣廉吏的要求和期待,为百官树立了楷模。群臣与附属于北魏的藩国、部落,则通过宴会中的歌谣与方舞,表达忠诚,陈述政见。在北魏前期定都平城的近一百年历史中,这些歌章在郊、庙、宴会中被演奏、传唱,又有新的乐章不断被创作、加入,形成一个由音乐构建的政治语境。

音乐对拓跋政权的特殊意义亦见于其官僚制度。北魏前期有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⑤北魏前期的尚书常因事立名,乐部尚书的设置可能与北族好歌舞的习俗有关。⑥《魏书》所见乐部尚书仅长孙石洛与陆隽二人,均出北族,分别在太武帝与献文帝时期任职,他们掌管的伎乐大概就是北魏宫廷常用的北族音乐。孝文帝太和年间,朝廷开始着意于雅乐的改革和建设。最初的改革仅针对乐章。《魏书·乐志》记曰:

> (太和)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⑦

高允此时已九十多岁,其奏上的乐府歌词是否为其新作难以确知,⑧但既涉及北魏建国之符瑞与祖先功德,大概还是不能脱离《真人代歌》《簸逻回歌》的范畴。其中又有“随时歌谣”,应该就是以《劝戒歌》《中山王乐》为代表的,因时、因人、因事而创作的,具有政治内涵与功能的新乐章。此时的主政者仍是冯太后,其选取乐章的标准是“不准古旧,辨雅、郑”,即不限定为古乐、旧乐,可以包括新声,但必须雅正。这种包含新旧,追求雅正的标准,在太和十一年(487)冯太后令中仍有延续。可见太和前期,以音乐为话语的政治表达仍未失效。但在“垂心雅古,务正音声”的孝文帝看来,⑨《真人代歌》等乐章因道

---

① 《魏书》卷九三《恩倖列传·王叡传》,第 1990 页。
②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列传·东阳王丕传》,第 554 页。
③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列传·东阳王丕传》,第 555 页。
④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东阳王丕传》,第 360 页。
⑤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985 页。
⑥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339—349 页。
⑦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 2829 页。
⑧ 郑钦仁认为此时高允已非中书监,高允当为高闾之误。参见郑钦仁:《北魏中书省考》,《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第 18 页。
⑨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 2828 页。

武帝等先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而得以流传,却导致北魏“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① 不仅如此,孝文帝的乐制改革扩大至音乐相关的机构与职官。太和十五年(491),简置乐官。次年,诏太乐与中书一起建设雅乐体系。大约在同时,孝文帝进行了第一次官制改革,废除了颇具北族特色的乐部尚书,拓跋世代传唱的古老乐章与宴会中的“随时歌谣”丧失政治功能,将是注定的结局。

二、宴会赋诗的流行

当以《真人代歌》为主体的北族歌谣渐渐退出北魏宫廷的政治生活时,宴会赋诗活动却正迎来兴盛时期。

北魏宫廷宴会赋诗活动最早见于太武帝神䴥三年(430)。《魏书·赵逸传》记此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称为善”。② 文成帝至献文帝时期(452—476),并没有见诸史籍的宫廷宴会赋诗活动,但游雅曾受诏作《太华殿赋》。虽无明证,这篇赋可能是文成帝太安四年(458)七月太华殿建成宴飨时的作品。和平二年(461),文成帝南巡,曾在冀州信都举行宴会,高允《南巡颂》称当时“文藻之流,歌永言以陈其志”,③亦有赋诗活动。皇兴四年(470),高允随献文帝北伐柔然所作的《北征颂》,或许也是此类作品。大概此时北魏宫廷中的宴会赋诗活动并不常见,因此记载较少。至太和中,由孝文帝主导的宴会文学活动大为兴盛。太和十三年(489)七月,孝文帝幸方山灵泉池,与群臣登上富有华夏文化意义的龙舟,赋诗游宴。④ 太和十七年(493)五月,孝文帝宴四庙子孙于皇信堂,行家人之礼:

> 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元)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⑤

连韵,即联句,是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南朝时流行于宫廷和士人之中,常由两人以上共同创作,带有竞赛性质。⑥ 太和中,这种起源于中原的文学游戏已然流行于平城的拓跋贵族之间。此次参与联句者,便是孝文帝五服之内的宗室诸王。⑦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对洛阳宫殿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自南伐返洛阳,“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因清徽堂建成后,“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⑧,便借东阁庑堂建成之际,与群臣依次游赏了流化渠、洗烦池、观德殿、凝闲堂等,并论诸殿堂园池得名之义。日近黄昏,孝文欲与诸王夜饮:

---

①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 2829 页。

② 《魏书》卷五二《赵逸传》,第 1145 页。

③ 《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六《颂十六》,东京:古典研究会 1969 年版,第 103 页。

④ 黄桢:《龙舟上的北魏皇帝》,《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03—429 页。

⑤ 《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城王澄传》,第 464 页。《魏书·高祖纪》记宴会地点在宣文堂,见《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 171—172 页。

⑥ 南朝宫廷中的联句,一般是君臣一人一句进行创作。北魏宫廷中的联句则是一人两句,青木正儿认为这是与柏梁体联句截然不同的形式。青木正儿:《联句浅说》,《琴棋书画:中国文人的生活》,李景宋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5 页。

⑦ 关于“四庙子孙”,胡三省认为是“世祖、恭宗、高宗、显祖之子孙”,即孝文帝高祖太武帝至其父献文帝之子孙。这一意见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康乐则认为恭宗未即帝位而死,无庙,四庙当指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与献文帝四位祖先。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世祖武皇帝下》“永明十一年五月”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4329 页;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版,第 236 页注 2。

⑧ 《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城王澄传》,第 467 页。

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高祖曰:“卿向以烛至致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①

群臣辞别前,崔光等人皆听命赋诗言志,孝文帝则在李冲上寿时,报以《诗经·南山有台》,称李冲等臣为邦国之基。而在家人之宴或群臣辞别这些特殊场合之外,孝文、宗室与诸臣会共同参与赋诗活动。仍然是在清徽堂,孝文帝与诸臣宴会,至日暮,移宴流化池。

(高祖)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元)勰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②

在酒兴渐浓的宴会尾声,孝文帝引《诗经·湛露》,以果实累累的梧桐喻在座群臣,命赋诗。参与宴会的王公大臣应该都参与了此次暮春应诏诗的创作,崔光诵读群臣诗作,孝文帝则对诸诗进行点评。不仅如此,孝文帝还为其异母弟,即时任中书令的元勰的诗作进行了修改。

南北朝至唐初,宫廷宴会中的应诏诗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些即时创作的诗歌虽有固定的套路,但也需要一定的学习和积累。北魏君臣的宴会赋诗活动,意味着他们不仅熟悉应诏诗创作的格式与方法,还掌握了此类诗歌创作所需的语言、素材与音韵等相关知识。③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北巡,停于上党铜鞮山,命随行的元勰在走向他的数步之间成诗。元勰依诏“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其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④元勰所谓“风云与古同”,是用曹丕令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调侃孝文帝。“三、五、五、五”的杂言诗体,则是南朝诗人常用的诗歌形式,如王肃《悲平城》、萧综《听钟鸣》《悲落叶》等,而此时的鲜卑贵族亦能应时而作。⑤

当然,北魏宴会诗的发展远不能与南朝相比。魏晋以后,诗歌成为文学的流行形式,宴会成为构成诗人、文士团体的重要方式,具有公众性的宴会诗也服务于政治的目的。⑥ 南朝宫廷中的宴会诗,不仅具有社交性与仪式性功能,诗作对王朝、帝王的歌颂,则使宴会成为君臣和合乃至政治和合的场所。⑦北魏时期的宴会诗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太和十九年(495)正月朔,南伐途中的孝文帝在悬瓠方丈竹堂宴飨群臣。

---

① 《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城王澄传》,第 468 页。

② 《魏书》卷二一下《献文六王列传下·彭城王勰传》,第 572 页。

③ 5 世纪后期到 7 世纪的宫廷诗的创作存在一种“创造性模仿”,其修辞与修饰均有一定的惯例,而这些惯例在南朝均可见其源头。参见宇文所安:《初唐诗》第一章“宫廷诗的时代”,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6—11 页。关于宴会诗歌创作的知识修养,参见陈春霞:《孝文帝改革后的民族融合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一章“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文化转型与文学发展(上)”,第 48 页。

④ 《魏书》卷二一下《献文六王列传下·彭城王勰传》,第 572 页。

⑤ 曹道衡:《略论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72 页;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北魏中后期文学和温子昇》,《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6 页。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杂言诗并非简单地对南朝文化的学习和模仿,参见金溪:《北朝文学的本土性及其对南朝文学的接纳》第五章“3+5 起句杂言诗体在南北两地的演变轨迹——兼论南北朝诗体的共生与分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82—321 页。

⑥ 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第四章“死亡与宴会”,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234—238 页。

⑦ 大村和人多篇论文涉及萧梁时期宫廷宴会诗的功能。参见大村和人:《宴という「別天地」——徐勉の「迎客曲」「送客曲」について》,《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第七十卷,2012 年,第 56—68 页;同氏:《深奥の宴——梁代『長安有狭邪行』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方学》第一〇六辑,2003 年,第 53—65 页;同氏:《六朝時代の宴における「言志」——梁詩はなぜ千篇一律か》,《六朝学術学会報》第八卷,2007 年,第 65—80 页。

乐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儁不废咏缀,未若今日。”遂命邢峦总集叙记。①

从孝文帝与诸臣依次“歌曰”来看,这些诗句有曲调,可以咏唱。而从内容来看,去掉无实意的“兮”字,君臣所作皆为七言,并在宴会后编辑成集,由邢峦撰叙。可见这次宴会赋诗实际是北魏君臣为主体的一次文人雅集。孝文帝以“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直抒一统南、北的志向,群臣则以“愿从圣明兮登衡、会”“文德远被莫不思”等诗句,表达对孝文帝南征举措的支持,以及对其文教、德政的称颂。在这场宴会中,尽管形式不同,诗歌却与北魏前期宴会的音乐一样,成为君臣交流的重要方式。

三、歌、诗兴替与北魏权力结构的变化

宴会诗不仅代替北魏前期的宴会音乐成为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随着宴会诗的兴盛,北魏文士群体的结构在太和前后发生了变化。前文已提及,最早的北魏宫廷宴会赋诗记载见于太武帝时期。此时的北魏正值武力扩张期,太武帝为何在这一年举行上巳赋诗活动呢?

北魏自始光三年(426)开始征伐赫连夏。神䴥元年(428)擒赫连昌,灭夏。这是太武帝即位之后,对柔然以外的北方独立政权的第一次征讨,不仅尽得赫连氏之府库宝藏,也继占据河东、河北后,再将河西广阔的牧地纳入疆土,从此“畜产滋息”,②对北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影响外,此次征伐还俘虏“秦雍人士数千人”至平城。③ 神䴥三年为上巳赋诗制诗序的赵逸为天水人,便是秦雍士人中的一员。他曾任赫连勃勃著作郎,入魏后,拜为中书侍郎。与赵逸一同入仕北魏的还有安定人胡方回,因文才受到太武帝赏识,“召为中书博士”。④ 虽然不能排除太武帝之前已有上巳赋诗,或者宴会赋诗活动的举行,但毫无疑问,数千秦雍士人继河北士人后进入北魏,极大地扩充了文学之士的数量,这是神䴥三年太武帝举行上巳赋诗活动的背景。而宴会赋诗活动的举行,也意味着文士群体的出现,象征着北魏统治阶层文学化进程的起点。

神䴥四年(431),太武帝又发布了著名的征士诏,征召数百士人至平城。高允《征士颂》中列举了当时应征的卢玄、游雅等 34 人。据统计,这三十多名士人(包含高允在内)分别来自河北、关中诸州的 16 个郡,皆为当地的大姓、名族。⑤ 他们多以儒学、经学见称,也不乏高允、游雅这样的文学之士。《魏书》有载的 13 人中,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的有 7 人。⑥ 正可谓“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这些富有教养的衣冠之士进入平城之后,“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⑦在仕宦、婚姻关系之外,逐渐形成以文学(包括儒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为媒介的交游网络。

这一交游网络的中心是有名望的士人。在这一时期,平城最具名望的士人是崔浩,前后进入平城的

① 《北史》卷三五《郑道昭传》,第 1304 页。

②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 2857 页。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 73 页。

④ 《魏书》卷五二《胡方回传》,第 1149 页。

⑤ 张金龙:《从高允〈征士颂〉看太武帝神䴥四年征士及其意义》,《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27 页。

⑥ 高允及其《征士颂》所记 34 人中,《魏书》有传者为卢玄、高济、李熙、游雅、宋愔、宋宣、张伟,高毗、高允、李灵、邢颖、韦阆、杜铨 13 人,前 7 人曾出使他国。当时的使者一般选用有文学的高才之士,参见曹道衡:《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53—376 页;蔡宗宪:《南北朝的聘使与主客》,《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北:稻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1—232 页。

⑦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 1081 页。

各地文学士人,很多都与崔浩有着或公或私的交游关系。赵逸因曾为赫连夏撰著文章而得罪太武帝,因崔浩进言得免,胡方回也受到崔浩的推重和赏识。神䴥四年进入平城的士人中,卢玄为崔浩外兄,高允、张伟曾辅助崔浩修撰国史。太延五年(439),太武帝亲征北凉,又有“(沮渠)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① 由凉入魏的士人中,以文学知名的张湛、阴仲达受到崔浩赏识,宗钦、段承根则与崔浩同时被诛,大概关系不浅。以儒学著称的常爽、程骏亦为崔浩所知。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学之士不断扩充平城的士人群体,其交游活动则将文学带入了北魏官僚的生活之中,这是北魏宫廷宴会诗、赋兴盛的前提。

至太和中,孝文帝主导并积极参与宴会赋诗活动,也很自然地取代有名望的士人,成为文士群体的核心。而原本处于核心地位的有名望的士人,则成为文士群体的第二级。他们处于皇帝与下一级士人之间,连结两者,又在文士交游中具有一定的领袖作用。这一角色往往由人数居多的河北士人扮演。② 崔浩之后,高允为文士之冠。高允“性好文学”,长于著作,历仕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③ 献文帝末年,高允推荐同样擅长文章的高闾代替自己,但孝文帝则将制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史称其“才藻富赡,好为文章”,且“有大文笔”,“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④ 孝文帝对制诏文书的掌握,与其在文士群体核心地位的构建实际是一致的。

高允之后,崔光成为文士中的领军人物。崔光曾参与国史修撰,孝文帝称其文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⑤前文流化池宴会中读暮春应诏诗者即崔光。孝文、宣武两朝的文学之士,有很多都经高允和崔光推荐与品评。高允晚年以高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⑥ 皇兴中,刘芳、崔光、崔亮、成淹等青齐士人进入平城,均受到高允的接待。蒋少游、高聪俱依高允,得到高允的赏识。祖莹、江绍兴、李璨、韩兴宗等以文才著称的文士也为高允所举荐、称赏。崔光则与刘芳、李彪、李树虎有着频繁的交往。北魏晚期的著名文士中,常景、祖莹、封肃等都得到过崔光的称赏与荐举。甚至出身拓跋宗室者,如“准的人物”的元孚、“黑头三公”之元彧、“后生领袖”之元子孝,以及有“宰相之器”的元显和,⑦亦为崔光品评。这些处于有名望士人领导之下的文士之间亦通过文学性的交往,形成错综复杂的交际网络,⑧构成了文士群体的第三级。

由此,孝文帝时期,平城形成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由有名望士人及数量众多的胡、汉文士构成二、三层级的士人群体。除了文士之间的交游之外,北魏的中书制度也为这一群体的构成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北魏前期的中书省主要由汉族士人任职。神䴥四年征召的士人大部分都拜为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⑨进入中书学成为中书学生则是汉人权宦、大族子弟重要的出仕途径之一,⑩而有名望的士人往往担任中书省长官。崔浩曾担任中书监,高允历中书令、监之职,崔光则由中书侍郎转黄门侍郎,后于宣武帝时期先后担任中书令、监。由此,在身兼士人领袖与中书长官的有名望士人周围,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群体。

---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 90 页。

② 据宋燕鹏统计,河北文士人数在北魏前期占比 59.46%,后期占比 41.26%。参见宋燕鹏:《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第二章“北魏文士的籍贯分布”,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5—147 页。

③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 1067、1086 页。

④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 187 页。

⑤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第 1487 页。

⑥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 1198 页。

⑦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列传·元孚传》,第 611 页;同卷《太武五王列传上·元彧传》,第 606 页;《北史》卷一七《景穆十二王列传上·元子孝传》,第 631 页;同卷《景穆十二王列传上·元显和传》,第 639 页。

⑧ 如李彪与宋弁、韩显宗、王肃、邢峦等士人之间均有频繁的诗文交往,王肃、元勰与祖莹曾在尚书省咏诗。刘懋与李平为友,又为清河王元怿所赏识。卢元明善文,为临淮王元彧和中山王元熙所钦爱。事例繁多,不一一列举。

⑨ 郑钦仁:《北魏中书省考》,《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第 45—46 页。

⑩ 严耀中:《北魏中书学及其政治作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136—148 页。

但是,北魏前期的中书虽掌草拟制诏之职,却并不算是切近中密的机要部门。早期任中书监的穆寿、穆平国父子本就是鲜卑勋旧且为拓跋姻亲,地位尊贵。李敷、冯熙则是倖臣、外戚。而崔浩任中书监之前已是司徒,职任重于中书监。李冲在担任中书令前,曾任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①渐得宠遇。以上诸例均非因为担任中书令、监才得以参与朝政机密。而崔浩被诛时,太武帝命中书侍郎高允草诏,高允因牵连人数众多,“持疑不为”“乞更一见,然后为诏”,②可知高允所得为禁中传出的太武帝之诏命,而非由太武帝面授。献文帝即位初,乙浑擅权,此时高允已是中书令,冯太后诛乙浑,特别“引允禁中,参决大政”,③亦可见北魏前期的中书令参决朝政的权力有限,这与魏晋时期掌机要,日在皇帝目前的中书令、监很不相同。④

北魏前期随侍皇帝左右,参与机密,传达诏命的应是出自鲜卑官制的内朝官。李敷曾任秘书下大夫,“典掌要切”,⑤前见掌管禁中文事的李冲则是秘书中散。下大夫为灵丘文成帝《南巡碑》中所见的“折纥真”,⑥中散为“内小”,两者均为鲜卑内朝官。又,《魏书》中明确记为“出纳诏命”者有明元帝时期的拓跋婴文、拓跋屈及穆观。拓跋婴文任职不明,传只记其“典出纳诏命,常执机要”,⑦拓跋屈“居门下,出纳诏命”,⑧穆观则以左卫将军“绾门下中书,出纳诏命”。⑨ 北魏前期的门下省多为担任内朝官的北族,⑩由此,“居门下”的拓跋屈与官职不明的拓跋婴文很可能就是鲜卑内朝官,甚至是近侍,而道武帝时期担任内侍的穆观则统摄拓跋屈这样的内朝官,为其长官。据记载,拓跋屈“善奏事,每合上旨”,⑪穆观则在皇帝“访旧事”,⑫即问询前朝制度、政事时,无所遗漏,令明元帝称奇。大概北魏早期负责传递消息,备皇帝顾问的内朝官多为拓跋宗室或北族勋贵,他们主要以口头传达的方式沟通内外,传承鲜卑旧制、旧事。至太武、文成时期,随着部分汉族士人进入内朝,文书、典章才被纳入这些内朝官的职责中。

尽管形式不同,但北魏前期宫廷宴会中的歌,与内朝官员口头传递消息、传承旧事的形式,实际都是文字传统不发达的鲜卑政治传统下的产物。在这一传统下,北魏皇帝与围绕其身边的拓跋宗室、北族勋贵构成了北魏前期的核心集团。他们说鲜卑语,用歌章、口头传承的方式延续着鲜卑人的历史与传统,并通过婚姻、功勋构建了同心圆的政治结构。⑬ 汉族士人组成的文士群体则在这一同心圆之外。虽然少数士人因统治需要或个人际遇进入了政治的核心,但与鲜卑贵族文化异质的中原士人,很难找到途径突破这一同心圆结构的坚实壁垒,直到太和年间,以孝文帝为中心的文士群体出现。

---

①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 1179 页。

②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 1071 页。

③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 1077 页。

④ 陈苏镇:《魏晋洛阳宫主要行政机构的分布》,《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年版,第 269—276 页。

⑤ 《魏书》卷三六《李敷传》,第 833 页。

⑥ 庞博:《北魏前期北族官职的汉译与改写——以“下大夫”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108—126 页。

⑦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建德公婴文传》,第 345 页。

⑧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拓跋屈传》,第 364 页。

⑨ 《魏书》卷二七《穆观传》,第 664 页。

⑩ 参见川本芳昭:《内朝制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与国家》,黄桢、张雨怡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9—161 页。

⑪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拓跋屈传》,第 364 页。

⑫ 《魏书》卷二七《穆观传》,第 664 页。

⑬ 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36 页。关于北魏早期的政治核心集团,还可以参照康乐:《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第 51—104 页;松下宪一:《北朝正史における「代人」》,《北魏胡族体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2007 年版,第 159—207 页。

通过宴会中公共性的文学创作,文士群体内部产生了对同一身份的认同,①并越过鲜卑贵族,与皇帝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成为中原士人进入北魏的核心政治群体、融入政治语境的有效途径。随着官制改革的推进,乐部尚书及鲜卑内朝官被废除。乐制改革则因涉及音律、度量衡、乐章等复杂要素,终北魏一朝,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雅乐体系。② 至朝廷禁绝鲜卑语,依赖口头传承的鲜卑歌章与信息传递方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以鲜卑传统音乐为主体的北魏既有音乐体系丧失了表达权力合法性与政治沟通、交流的功能,文学表达则代替音乐与口头传承,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表达方式。这是孝文帝有意经营的结果。这一转变使得中书省职任渐重,以至于北魏晚期门下省侵夺中书草诏职能,造成“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的局面。③

需要强调的是,孝文帝通过宴会诗建立与中原士人之间的联系,并非要剥夺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太和十六年(492)以后,元澄、元勰先后任中书令。宣武帝至孝庄帝时期(499—529),担任中书监的 17 人中,④有元勰、元愉、元悦等 8 位宗室,以及穆观曾孙穆罴、穆绍兄弟,占据人数一大半。可见孝文帝及其继任者希望鲜卑勋贵能够掌握制诏的权力,同时也能通过中书令、监的职位,成为胡、汉文士的领袖。由此再看前节清徽堂宴会,孝文帝对元勰诗作做一字之改,又感叹中书令的任命为得才,都是为了稳固元勰在文士群体中的地位。至此,北魏后期的文学不仅具有了政治表达的功能,也成为一种文化与权力资本,这便是孝文帝时期宴会诗兴起的最重要的意义。只是鲜卑勋贵向来不以文学见长,北魏后期的拓跋宗室虽颇有文士面貌,但在士人群体中的影响比较有限。而对于迁洛后仍然认为“北人何用知书”的原部落联盟成员来说,⑤如果不能掌握文学这一文化与权力资本,那么必将在之后的政治竞争中被逐渐淘汰。

结　论

如文章开头所说,宴会中音乐与赋诗活动的兴衰,是北魏政治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体两面,反映的是孝文帝改革中不同政治传统的消逝与构建。孝文帝实施改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源于他对中原文化的倾慕,也为了与南方政权争夺正统,同时,也出于调整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考虑。这种调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收缩鲜卑核心权力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吸收中原士人进入权力核心,使其成为皇权的另一个支点。这种调整见于孝文帝郊祀、宗庙、爵制、五服及官制等改革中。太和十九年(495)定姓族,孝文帝诏鲜卑勋贵八姓一同汉人四姓,为最高门第。并且不论胡汉,姓、族的区别皆依据三世以内的官爵而定。⑥ 可以说,此次定姓族从法令层面确认了汉人高门与拓跋贵族之间平等的地位与权力,也是北魏核心权力结构转变的最直接的体现。

当我们使用“汉化”来描述这些变化时,隐含的语义是孝文帝按照中原王朝的模板,依据代表中原政治文化的南朝典章制度,重新构建北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但学者也注意到,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鲜卑贵族并未完全丧失其在政治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北魏的门阀社会与南朝士族社会也不尽相同。南朝的士族接续魏晋,天然地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身份绑定,而北魏的士族,尽管能通过仕宦取

---

① 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魏晋南北朝史丛稿》,第 263—282 页;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第四章“死亡与宴会”,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第 234—239 页。

② 参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第二部分第一章“楽制改革の歴史的前提——流亡する伶人”,第 184—187 页。

③ 《魏书》卷三八《王遵业传》,第 879 页;又参见漥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第二章“北魏門下省初稿”,东京:汲古书院 2003 年版,第 63—68 页。

④ 北魏后期任职中书监者,见郑钦仁:《北魏中书省考》,《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第 19—25 页。

⑤ 《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列传上·广陵王羽传》,第 550 页。

⑥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9—92 页。

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却缺乏文化优越性。① 尽管北方的汉人士族在西晋之后仍然保持着儒学的传统,鲜卑贵族也经过儒学教育,逐渐具备文化教养,但孝文帝改革前后出现的某些文化变迁,并不是北方社会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孝文帝推进改革的一环,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与功能性导向。

北魏宫廷中的歌、诗兴替便是这种工具性与功能性导向的直接体现。北魏前期宫廷中的宴会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由歌、舞、赏赐等内容构成的一种政治空间。宴会中的歌、舞,不仅具有类似中原雅乐阐述国家历史与权力来源、构建正统性的功能,又能随时、随事创作,成为宣传政令、进行政治交流的特殊语言。由此来看,北魏前期的宴会歌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实际类似于、甚至不亚于中原传统的文字与书写。而北魏乐制改革的失败,使以《真人代歌》为代表的北族音乐传统中断,丧失了政治表达的功能。大约同时,源于中原文化传统的诗歌取代了音乐在宫廷宴会中的政治表达功能。宴会诗的兴盛是孝文帝主导并推动的。这一活动改变了北魏前期政治的核心结构,使中原士人可以通过文学与皇帝建立直接的联系。随着官制改革废除源于鲜卑的内朝官制,鲜卑文化中的口头传承传统也退出政治舞台,文学成为通向权力核心的政治资本。

尽管北魏文学难与南朝争胜,但有政治权力作为推手,仍然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面貌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是孝文帝改革对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埋藏了巨大的隐患。迁都洛阳不到半世纪,北魏便走向了混乱与分裂,文学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在北朝后期并未得到延续。“文”的地位的提高,及其与以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政治形态的高度结合,要留待下一个时代。②

The Songs and Poems Presented at the Banquet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Liu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reform launched by Emperor Xiaowen (孝文帝)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s a significant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Northern Wei history. The musical pieces and poems presented at the court banquet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wo political traditions: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北族) and the Central Plains (中原). During the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riginated from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functioned as a political language, undertaking the role of elucidating the origin of state power and facilitat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y lost their functional foundation after Emperor Xiaowen's reform.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rigina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propelled by Emperor Xiaowen, served to reshape the political and power structures along with his other reform measure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y provided an effective pathway for the schola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break through the political circles with the Xianbei (鲜卑) nobility as its core, which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marriage and military exploit. The rise and fall of musical pieces and poems presented at the court banquets were not only manifestations of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ethos and cultural fabric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ut also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that transformed literature into a cultural and power capital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 words: banquet; music; poem; reform launched by Emperor Xiaowen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political culture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薛海波:《北魏孝文帝构建门阀制新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第 146—156 页。

②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序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6 页。